

从圣坛神座之上，回归到人间大地的孔子，是我们可以平视的。

平视孔子或别的哲贤，使我们能有理性的认知，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深怀敬意。

走下圣坛的孔夫子

伊人·著



◎ 伊人 著

走下圣坛的孔夫子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走下圣坛的孔夫子 / 伊人著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6.7
ISBN 978-7-5568-2033-7

I. ①走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孔丘（前551-前479）
- 人物研究 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6854号

走下圣坛的孔夫子 伊人 / 著

出 版 人	张秋林
责任编辑	凌 云
装帧设计	程 晨
出版发行	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 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20mm×960mm 1/16
印 张	27
版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68-2033-7
定 价	3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—04-2016-482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(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 0791-86512056)

目录

CONTENTS

平视：让孔子回归为人——写在卷首 / 001

卷一 多维视角观照人间孔子

- 学者孔夫子 / 009
- 先师孔夫子 / 018
- 孔子的“六艺”之教 / 032
- 行道者孔夫子（上） / 055
- 行道者孔夫子（下） / 069
- 政论家孔夫子 / 086
- 异见者孔夫子 / 107
- 哲人孔夫子（上） / 120
- 哲人孔夫子（下） / 133
- 性情孔夫子 / 152
-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（上） / 166
-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（中） / 183
-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（下） / 202

卷二 理性光束扫描孔子儒学

- 孔子是怎么“圣”起来的 / 217
- 《论语》这部书 / 225
- 孔子的“理想国” / 235

“己所不欲”与“己所欲” / 243
隐，还是不隐，这是个问题 / 251
有多少“孝”今日可行？ / 261
夷夏之防：三千年的“意底牢结” / 280
君子·小人·女子 / 301
从“不仕无义”到“官本位” / 312
孔子及儒家的“不知” / 321
孔子儒学和民主 / 338

卷三 探幽：在阑珊处和世象中

孔子长什么模样？ / 361
孔子痛感于“好色者” / 367
异哉“血性”孔夫子 / 372
《春秋》为何特别青睐这个女人？ / 376
孔子为何鄙视“言必信”？ / 380
孔子为何“叫停”子路行仁？ / 384
孝子曾参为何受责于“孝”？ / 386
先儒的哭丧之礼 / 389
喜闻新人向孔子“宣誓” / 394
在孔府买了本有意思的书 / 402

附录：

关于《平视孔夫子》答客问 / 410

初版后记 / 417

修订版后记 / 421

主要参考书目 / 424

平视：让孔子回归为人

——写在卷首

孔子被尊崇为“圣人”，已有两千多年了。

在历代遍立的孔庙（或称文庙、夫子庙），“望之俨然”的孔子圣像，备享儒生士子、公卿政要拜祀如仪；旧时官学以及乡校，莘莘学子对“至圣先师”神位跪拜礼敬；至近几年来祭孔大典“猗欤盛哉”，仰瞻超规格超豪华“八佾”之舞，尤使恭与其祭者起敬起畏……这一切，似乎是天经地义。

然而，本书所谈说的，却是“平视孔子”。

对“圣人”孔子，竟不诚惶诚恐、仰而瞻之，这可以吗？

笔者认为是可以的。

且将“可以”之理由，先在此简略道来——

俗谚曰：时势造英雄。同样的，时势亦造就哲人。

孔子生当春秋之世。在此时世，王纲解纽，礼崩乐坏，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”……这是孔子感叹的“无道”之世。然而，正是表征为“无道”的空前的社会大变动，形成当时“官学”式微、学术下移的时势，从而使时代的哲人及其学派有了自由生长的沃壤和空间。

在孔子之前，已不乏思想的前驱者，如周太史史伯，鲁国的臧文仲，吴国的季札，郑国的子产……他们都是当时的大学者（或兼为政治家），跟孔子不同的是，他们多为

贵族卿大夫，他们没有自立学派，他们的思想大多见诸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典籍的记述。

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哲贤，有齐国的晏婴，晋国的史墨，郑国的邓析，还有道家的创始者老聃，等等。可见，在春秋之世，孔子不是横空出世者，亦非踽踽独行者。

至孔子身后的战国时期，更是诸子辈出——墨翟、杨朱、孟轲、庄周、惠施、公孙龙、邹衍、慎到、李悝、荀况……处士横议，百家争鸣，思想多产，智慧辉映。从春秋到战国，那真正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“黄金时代”。

我们看到，在那“黄金时代”里，孔子是诸子之一，是哲贤之一，并非是唯一。

我们还看到，诸子中亦有不逊于或优于孔子的哲贤。

比如老子，他的深邃精奥的形而上哲学思辨，是孔子无以企及的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道老子：“趋于深入的思维方式，对立与颠倒的思维方式”“进入了世界的根源之中”“老子的道是在超越了所有有限性时达到最深层次的宁静”……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在世界上的影响力，亦是孔儒经籍不能比肩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，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，除了《圣经》之外，就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

比如墨子，除了他的博识多能，其个人的人格和德性，亦为当世所公认且服膺，墨子恪守“君子以身载行”，为了践行道义的信念和主张，履危蹈险在所不惜，“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”。“杀身成仁”“舍身取义”（孔、孟名言）之于墨子，不祇是堂皇的言词而已。《庄子·天下》虽批评墨子“以苦为极”，却也感佩赞曰：“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将求之不得也！”甚至连孟子都不得不承认：“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。”

比如庄子，秉持其独立人格，睥睨人世间的权势者，蔑视俯顺权势的奴才人格；坚抱其自由精神——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，显示出卓然于世的超迈；至于其文章的奇譎恣纵、深閤而肆，“晚周诸子莫能先”（鲁迅语），那就更不消说了。……

因此，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华夏“黄金时代”——雅斯贝尔斯所称的“轴心时代”——我们眼里岂能只有一个孔子，而对若群星璀璨的诸子哲贤，却视而不见、漠视若无？

或曰：孔子是大圣人，诸子中的哲贤不能跟孔子同日而语，又怎么能将他们与孔子一视同仁？

我们知道，在孔子晚年和他离世不久，就有子贡等弟子喻赞夫子为“日月”“尧舜”，

初现出圣化的端倪；此后孟轲、荀况等更造作渲染，强化孔子“圣人”形象。而孔子真正做定“圣人”则是在汉代。汉武帝刘彻初践帝位，采纳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策，得皇家官方钦定，于是孔子名正言顺成为独尊的“圣人”。读史可知，西汉时相当多的儒生已然方士化，献策尊儒崇孔的董仲舒即非纯儒，乃是“儒家、经生和方士的混合体”（周予同语）。当时，董仲舒们不仅尊孔子为“圣人”，还奉孔子为“素王”，宗孔子为“通天教主”，将孔子抬到了吓人的高度。

于是便有纬讖之书应运而生。在此类书中，说孔子的母亲有一次在梦中跟黑帝交合，不久生下孔子，孔子既然是黑帝的后裔，所以又称为“玄圣”（玄者，黑也）。关于孔子因何降生于春秋之世，据纬讖书说，这是因为孔子奉上天和使命，担负为汉王朝“制法”的大任，孔子所作的《春秋》《孝经》，就是其中两部“法典”；孔子后来携弟子在端门向上天“告成”，得到上天的启示：“宝文出，刘季握……”（刘季即刘邦）。就这样孔子为三百多年后的刘氏王朝做了“先遣队”。诸如此类，离奇怪异，荒诞之极。

历史学家顾颉刚在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》中，曾一语道破天机：“皇帝利用儒生们来创造有利于他自己的宗教，儒生们也利用皇帝来推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宗教。皇帝有什么需要时，儒生们就有什么供应。这些供应，表面上都是由圣经和贤传里出发的，实际上却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借取的。”可见，圣化和神化孔子，其实不过是儒生和帝王之间相互利用而已。而那被圣化、神化了的“孔子”，跟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孔子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因此，经学史家周予同说：“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假的孔子，而不是孔子的真相。”

眼里唯有被圣化、神化的假孔子，往往就容不下更多真实存在过的先秦哲贤，当然更不必说一视同仁了。

时至现代社会的今日，像孔子是黑帝之子、孔子为汉朝“制法”之类的呓语谎言，大概很少有人相信，也罕有人再张扬那样的货色了——虽然翻印的《孔子圣迹图》之类，有时我们还能看到。如今的学者无论怎样崇仰孔子，一般也不会像汉代的儒士和经学家那样，再把孔子说成神魔状的“通天教主”。但这并不妨碍有些学者继续塑造假孔子的事业。

历史学家朱维铮说：“历史上的所有假孔子形象，可以说都是某种特定的辩护论的产儿。”而近数十年来的假孔子形象则是出自“新辩护论”。新辩护论者看似与汉儒相反，要把孔子由神还原为人，然而，正如朱维铮犀利指出的：他们“预先假设这个孔子是个古往今来的完人。他们旁征博引，考订辨伪，在史料上花了莫大力气，想证明这一假设。然而，没有人能够离开自己的时代而从事思考与活动，也没有人能够超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，所以孔子只能是历史的人，被春秋晚期鲁卫诸国实际生活进程规定了活动方式的人。在一切时代一切区域都是‘完人’的孔子，在生活中从不存在，或者说只存在于想象之中。……他们没有使孔子由天上降到人间，反而使人间增添了一个神灵样的假孔子，一个只有幻想的神才具有的超时空性格的假孔子。”真是一针见血，鞭辟入里！

事实上，孜孜于造作假孔子的，不单是那些“旁征博引，考订辨伪”以证明其“假设”的学者——毕竟他们还是认真下了功夫的——还有不少玩别的花样的、等而下之的新辩护论者，如穿凿附会，故弄玄虚；离析章句，妄作别解；无视常识，信口雌黄；搬弄“洋学，生拉硬扯……如此这般，恣意涂抹，刻意包装，推出升级版“摩登圣人”或调制“心灵鸡汤”的假孔子。甚至有“学者”宣称，孔子倡言“宪政”，是“宪政主义”的祖师。汉代经学家让孔子奉天命为三百年后的刘汉王朝“制法”，现如今的“学者”更了不得，竟要孔子提前两千四五百年为中国人创制“宪政”！

老的假孔子，新的假孔子，前赴后继，眩世惑众；但还是那句话：跟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孔子又有什么关系？

我们若是不想被造作出来的新老假孔子眩惑，那就得让孔子真正地回归——回归为真实的历史情境中的人，即“被春秋晚期鲁卫诸国实际生活进程规定了活动方式的人”。

如此回归的孔子，没有涂抹粉饰，没有金铂华衮，没有“圣人”光轮、“素王”尊号，没有高踞圣坛神座之上，一句话，就是让孔子真正回归为孔子。

孔子的回归，无伤其伟大。孔子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哲人，他的一些睿智通达的思想、言说，无疑仍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。当然，同时我们也该记得墨子、老子、庄子、惠施等众多伟大哲贤，也该珍视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

和思想资源。正是孔子及诸哲贤的思想原创力和各自的卓越贡献，共同造就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富饶丰赡和思想库藏的博大精深。

孔子回归为人——人性的而非“神性”的人，则孔子既特具其人性的卓异不凡，亦有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常，当然也难免会有人性的弱点；而作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，孔子既有拔萃于世的光耀，同时亦不免于历史的局限。没有人性弱点和历史局限性的所谓“完人”，是从来没有，也永远不会有。“圣人无谬”，这是自古以来造圣者编出来的神话。从《论语》等典籍可知，孔子从不承认自己是那种“圣人”。而墨子、老子、庄子等众哲贤，他们作为人性的人、历史的人，无一例外，亦是如此。

从圣坛神座之上，回归到人间大地的孔子，是我们可以平视的。平视孔子或别的哲贤，使我们能有理性的认知，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深怀敬意。

可以平视的孔子，较之只能匍匐仰瞻的孔子，哪个更接近于真实存在过的孔子呢？应该是前者吧。

因此，笔者起意要写这本“平视——让孔子回归为人”的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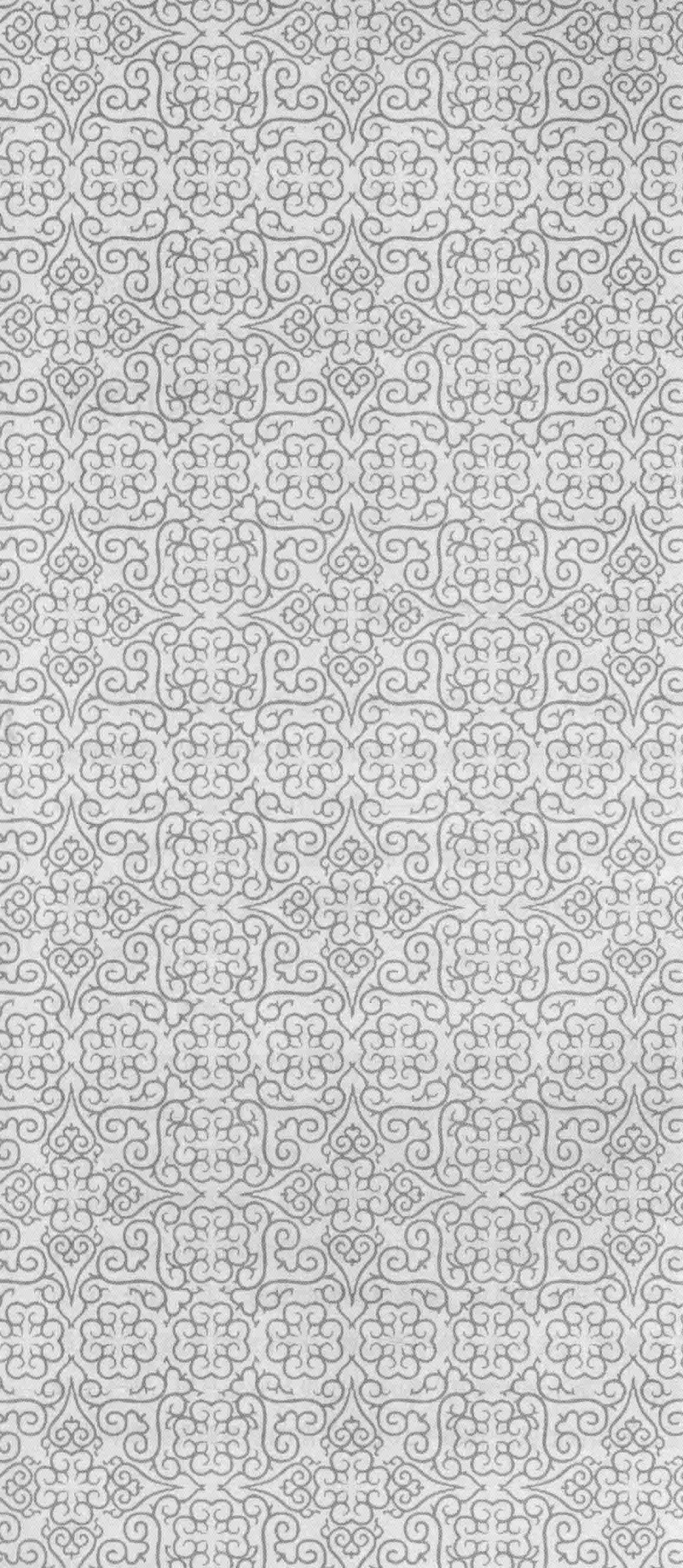
在本书中，笔者勉力为之的是：以现代人平等的人格，理性的目光，平视孔子，而不是跪伏仰视；以平常心看待孔子，以平和的态度分析孔子，以平实的语言讲述孔子，力图呈现出一个本然的而非伪饰的孔子；并且对孔子儒学的若干思想命题，于平心静气的探究中，作出既不谀亦不诬的平正的解读论析。而这一切，都必以经籍原典为凭据，依循“言之有据，言之成理”的律则。言说的周密性，亦是本书所冀求，不过度阐释，不穿凿附会，不天花乱坠，不妄加发挥，不曲意掩饰，不恣意褒贬。笔者领教过有些巧言、高言、玄言乃至谎言的大著，时时以此为鉴。

漫漫两千多年来，国人（尤其是士人）磕头磕得够多了，精神的匍匐也够久了。

我们该站立起来，我们该可以平视了。

卷一

◎ 多维视角观照人间孔子



学者孔夫子

孔子首先是一位“学者”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（悦）乎？”《论语》编纂者以这句话作为开卷之语，饶有意味。从这句话里，不难想象孔夫子溢于言表的欣悦之情。我们也由此获得了第一印象：孔夫子首先是一位学者——以“学而时习之”为莫大乐事的学者。

“学者”一词，如今是一种称谓，专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或造诣的人。然而在古代，“学者”的原初本义，则是指求学的人，比如《论语》中有句孔子的话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这里的“学者”就是指求学的人。本篇谈说“学者孔夫子”，也是以“学者”的本义而言。

我们知道，在与孔子同时以及其后的时代，有不少以学习为志趣的学者。如老子，《史记》说他是“周守藏室之史”，就是王室文献典藏馆的主管；整日坐拥书城，自然是他潜心治学的“近水楼台”，而一部《老子》则是其博学深思的灿烂结晶。又如墨子，有时远游别的诸侯国，车里满满当当装着书，有学生见而怪之，问为何“载书甚多”；他说早先周公旦白天读书百篇，自己又岂能懈怠？《庄子·天下篇》称墨子“好学而博”。还有一位以“车”载量的学者是惠施，也是在《庄子·天下篇》里，说“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”，这是指他学问广博，著作有五车之多，“学富五车”这句成语就是由此而来。而庄子呢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“其学无所不窥”，同样也是广为涉猎的博学者，而且当时那些满腹经纶的宿学之士几乎都曾受到他的批评。至于孟子、荀子、韩非子等人，

当然也同样如此。可以说，春秋、战国时期的百家诸子，无一不是孜孜不倦的学者。不过，像苏秦等辈那样做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的苦读状，恐怕就谈不上“不亦悦乎”，而颇有些自虐的味道了。

所以，孔子作为孜孜于学的学者，在先秦时代并不算特别稀罕。孔子说过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不说在百室或千户之邑，也不说是在鲁国，更没有说普天之下，而只是说在仅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，没有谁比得上他好学的。夫子在自信“好学”这一点上，也相当谨慎。

孔子的卓尔可敬，在于他是以身说“学”，孜孜而谆谆地倡导着一种“学而时习之”的精神。一部《论语》，“学”字出现64次之多，其中多数出自“子曰”。这在先秦的典籍中是罕见的（未记录在籍的孔子说学、倡学、劝学的睿语箴言，想必还不止这些）。孔子正是以自身敏而好学、学而不厌的风范，以及他所倡导的“学而时习之”的精神，垂范后世，感染、激励和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。

孔子靠的是“自学成才”

孔子没有上过什么重点小学，更没有上过名牌大学，孔子成为一位博学者，所凭藉的乃是“自为学”（钱穆语）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自学成才”。

我们知道，在古代没有“中学”，只有小学和大学。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说：“天子命之教，然后为学。小学在公宫南之左，大学在郊。”按周代的学制，学生（当然全是男性）是八岁或十岁上小学，成年（一说十五岁，一说二十岁）入大学。然而这些小学和大学，无论是在周天子的王畿，还是在诸侯的封地，都是贵族子弟学校，孔子当时是没有资格进入的。虽然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是战功赫赫的武官，但正如钱穆所言，是“上不列于贵族，下不济于平民，亦是一士”。孔子三岁时，年近七十的父亲去世，没有留下什么家产，母亲颜徵在带着他回到娘家，孤儿寡母，生活较为拮据，而且社会地位低下，贵族子弟的小学 and 大学，对于孔子来说，当然是不得其门而入。

春秋时期，有些诸侯国设“乡校”，鲁国是否也有，以及孔子是否曾入乡校就读？不得而知。有作者说“孔子少年时上过一段时间的平民学校”，不知有何根据。《论语》研究家杨伯峻指出：“孔子以前，学在官府。《左传》载郑国有乡校，那也只有大夫以上

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。”因此，春秋时的鲁国在孔子创办私学之前，是否就有平（庶）民学校，这就很可怀疑。
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述：“孔子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”由此可知，孔子最初的“学”，是从孩提时的游戏开始的。只是他乐此不疲的游戏，不是捉迷藏之类，而是把祭祀之类的礼仪演示当作了游戏。这是因为孔子的母家乃士族家庭，亲戚多从事以相礼为谋生的儒业，孔子耳濡目染，发生了嬉戏仿学的兴趣，由此也可能隐萌了他日后的文化选择。孔子母家的男人（外祖父、舅舅等亲戚）多为有一定文化的“士”，因此他童年时很可能是从他们那里学会识字、记数，乃至初步接触到“六艺”的知识和技艺。

孔子自述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这表明孔子自觉自为的“学”，是从十五岁开始的。进不了贵族大学之门的孔子，自己潜心修习“六艺”课程，这“六艺”就是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它们是当时大学的必修课，也是那时的儒者谋生、进身之术。以孔子的用功和颖悟，他对“六艺”的学习和掌握，必是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。对于家境尚贫困的孔子，这些也曾是他谋生的技能，他当过管理仓库、出纳钱粮的“委吏”，做过主管牛羊放牧蕃息的“乘田”，可能还干过他所认为的其他“鄙事”，如为人治丧相礼之类。

后来里巷中有人似惋惜又似讥讽地说：“了不起呵孔子，学问广博却没有足以出名的专长。”（“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”）孔子听到之后并不介意，有点自嘲地说：“我专于什么呢？专于射箭吗？专于驾车吗？我还是驾车吧。”（“吾何执？执御乎？执射乎？吾执御矣。”）

再后来，有一位太宰却颇为钦佩地说：“夫子是位圣人吧，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？”（“夫子圣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”）孔子的回答是：“我年少时贫穷，所以学会不少卑贱的技艺。君子需要这么多技艺吗？不要这么多的。”（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）可见，对于把“六艺”作为谋生的技艺，孔子内心是不满足也不满意的。

在“志于学”后的几年里，孔子又渐生了一种新的自觉，这就是：不仅把“六艺”当作“艺”（技艺），而且更要探究其内涵，在义理的层面来认知、践行“六艺”（尤其是礼、乐）。这正是孔子此后孜孜以求的更高志向。

孔子“游学”问礼

孔子最为倾心、服膺的是“周礼”。

鲁昭公二年（公元前540年），晋国的使臣韩宣子到鲁国，看到丰富的文献典籍，感叹说：“周礼尽在鲁矣！”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，周礼等典籍据传就是周公所作。孔子潜心研学周礼之后，对“礼”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在他看来，“礼”不只是礼仪形式，不仅表现于器物，如他后来所说的：“礼呵礼呵，难道仅仅是指玉帛而言吗？”（“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”）“礼”更是一种典章制度，也是他心目中的“义理”所在。孔子说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”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就其学周礼而言的——周礼是孔子至死都笃信坚守的“善道”，既怕学不到家，更怕学到了又失去。

我们知道，孔子是殷商的后裔，他的先祖微子启是殷纣王同父异母的兄长，说起来殷纣王便是他先祖叔了。然而，孔子心仪的却是灭了殷商的周文王和周武王，笃学、信从的是周公之道。孔子晚年时甚至感伤叹息：“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！”（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！”）由此可见，孔子对曾在梦中常见的周公是何等地景仰。

孔子在其办学授徒约四五年后，得到一次赴周朝都城洛邑（今洛阳）“游学”的机会，此事缘起于一位少年的提议，这位少年就是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南宫敬叔。孟僖子生前曾嘱咐他的两个同岁的儿子何忌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——由此可见孔子办学不久就已有相当的名望了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南宫敬叔向鲁昭公提出：“请帮助孔子去周都吧。”昭公爽快应允，拨给孔子一辆车、两匹马，还有一个驾车随从的仆役。《孔子家语》则指明，是孔子先向南宫敬叔表达了意向——自己想去周都向“博古知今”的老聃问“礼”；于是南宫敬叔便向昭公提出了请求，而且自己也随同前往，此时他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。

关于孔子向老子求学问礼的故事，曾有论者（如梁启超等）质疑，认为老子及其著作出自战国末期，因此所谓孔子问学之事不可信；但也有不少研究者予以辩驳，以《庄子》《礼记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典籍都有孔子问学于老子的记述，足以参证此事确非子虚乌有，如儒学研究家徐复观就坚信于此。

孔子就“礼”的一些问题，向老子虚心请教，在《礼记》中对此有多处记述。老